

忆王家斌二三事

王松

有句话,叫永远活在心中,这话确实有道理。直到现在,我仍不相信,家斌已经走了,离我们而去了。在我的意识中,他仍然是那么真实的笑呵呵的样子。但他的儿子王震海,也是我在作协的同事,一个做编辑工作的青年作家,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是真的,他父亲真的走了。现实和意识是两回事。意识可以不承认,但现实,由不得你不承认。

家斌老师,真的是已经永远地去了。我第一次知道王家斌这个名字,是在1982年春天。当时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一所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学教书。当时无聊,就找些报刊来看。一次,无意中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叫《大海落叶》。当时登载的位置我还清楚记得在副刊正下方靠左的位置。这个小说一下吸引了我。我是在中间看到的,看了还想看,就去资料室把前面几期的报纸都找来,从头看。这个故事写的是在东南亚的华人如何组成社团为叶落归根共同努力的故事。也就是从那一次,我记住了这部小说作者的名字——王家斌。

我那时刚20多岁,又是数学专业出来的,虽已开始学写作,但一想到著名作家,就觉得离得很远。尽管后来听说王家斌就是天津的作家,也觉得遥不可及。但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天津市作协在市委党校办了一期业余作者培训班,我有幸参加了。这期间,作协机关搬家,从新华路搬到一个临时地方,我们这些学员就都来机关帮忙。中午,作协领导留我们在机关门口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也就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家斌。

当时作协的秘书长是马丁,一位非常好的作协领导,对培养业余作者尤其是年轻作者的责任心和热情,在今天看来都让人难以置信。现在回想,当时家斌老师应该是他特意叫来的。马丁给我们介绍,这是王家斌老师,很有成就的著名作家,马上就要休创作假了。王家斌立刻笑着摆手,说什么老师,就是你们的老大哥。他说这话时就坐在我对面,神态很有特点,端着肩,把头微微往前探。后来这些年,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每次跟我说话都是这样的神态,显得认真,也很真诚。我当时一下激动起来,敢情面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家斌。我脱口说了刚看过他的《大海落叶》,他一听摆手,憨厚地笑笑。他这憨厚的笑里含着一种智慧,是那种作家特有的智慧。他说话有口音,我至今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口音,也没问过他。

吃着饭,马丁告诉我们,王家斌老师当过船员,是在海上经过风浪的,而且跟着船去过日本的横滨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时,我看着他,想起他的《大海落叶》中的一些情节,心想难怪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有见识,有胆识,也经过世面。

马丁对我们说,你们谁有问题,可以问家斌老师。这一下就热闹了。这次吃饭,本来是作协为大家帮机关搬家辛苦,犒劳一下,但由于家斌老师的到来,又有了文学味道,似乎是把培训班办到了这个小饭馆。家斌老师很平易近人,也很有耐心,他说话声音厚实,而且不轻易打断对方的话,总是耐心地先听完,然后再讲解。他讲解时声调反倒放低了,语气也很平和。他问了每个人的创作情况,又笑呵呵地谈起自己的一些创作体会。说话时还是那样的神态,端着肩,微微朝前探着头,一边说一边微笑。

后来经常有一些座谈或讲座之类的活动,又见过家斌老师几次。每次见面都是笑呵呵的,端着肩,微微探着头,问我最近又写什么了。当年他还坐班,而他早已是专业作家,偶尔到单位也是因为有事,都来去匆匆。后来他的长篇《百年海狼》很火。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天津电视台专门为他做了一期访谈节目。当时的很多报刊上都能见到关于《百年海狼》的评论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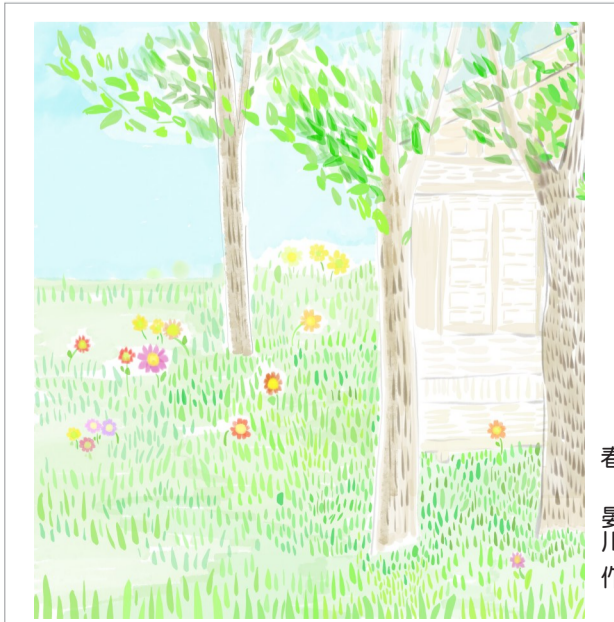
2008年,我去江西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活动。在赣南时,突然接到家斌老师的电话,说起我的中篇小说《双驴记》。我当时很感动,因为从他说起的话里能感觉到,这个小说他看得很细。他从叙事语言、故事结构、人物设置以及内在情绪的紧张感等方面一一说来,一边说还不时地问我,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我告诉他,方便。后来,他又说起我写的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他认为,小说家也应该有理论方面的思考。他显然知道,我当时不是说这些话的语言环境,但听得出,他是太兴奋了,一说起来就刹不住。最后他说,找个机会吧,咱们见面聊聊。

但这之后,我跟他再见面,就已是9年以后。这中间,我们又通过一次电话,让我印象很深。我当时一看是他的电话,就意识到应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但听他说了,好像倒也没什么不寻常。他是个有着极深文学情怀的作家,这应该是他们那一代文学家共有的特点。他在电话里对一些文学现象表示忧虑,而且说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这老兄还没老,他能想到这些,就说明他的思想还充满活力。我当时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回答,还行。后来跟他见面是在2017年,作协组织每年一次体检的时候。当时医院的楼道里很乱,我正坐在一个诊室门口,他喊了我一声,立刻朝我走过来,不过这次没有笑。他也许是觉得我们见一次不容易,一屁股坐到我身边,又说起让他忧虑的问题。这时,我看着他满头白发,心里有些感动。家斌的头发一向很粗硬,但在我的印象里,很早就花白了。而此时,他的头发真的是如雪一样的白了。我在心里想,这老兄真的是老了。但他仍在跟我说着与文学有关的问题。后来,他在我肩膀上使劲捏了一下说,接着写啊,好好写你的小说。说完又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就起身走了。

我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成了我的永别。那以后,我一直忙写作,或到各地去,跟他再也没见过面,也没通过电话。我只是偶尔让他的儿子王震海替我去对他的问候。直到他去世,我才听说,他后来竟然患了脑梗,而且很严重,最后也是因为这病去了。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一种朋友间的交往,平时似乎很少联系,但每次无论见面还是电话,都好像昨天刚刚联系过。也许,这种交往的朋友,就是知心朋友吧。

家斌,就是我这样的朋友。现在,已经春暖花开。家斌老师,家斌老兄,但愿你那里,也有春暖花开的季节。



原上草

春 晏川作

往事与旧情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 □宋曙光



1994年,魏巍夫妇拜访孙犁(中)合影

宋曙光 摄

那年夏季,我到北京约稿,专程赴北京军区拜访了魏巍同志。在家中,魏巍和他的老伴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先参观了花草茂盛的庭院,又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还照了一张合影。魏巍那天穿着半袖的白色衬衣、绿色军裤,显得儒雅又不失军人风度,背景就是他家温馨而花香四溢的庭院。

那之后,魏巍同志寄给我一组回忆战争年代的诗稿,很快就在副刊上发表了。不久,他又写来一篇散文《我的老团长》,怀念他在战争年代结识的一位战功卓著的老团长,并以老团长的去世发出了在当今社会我们该怎样继承他们创造的事业的深刻提问。文章发表于1994年3月17日“文艺周刊”,后又收录于2002年8月出版的《半个世纪的精彩——“文艺周刊”散文精选》一书。

也是在1994年春天,魏巍夫妇前来参加老作家梁斌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暨80华诞研讨会。魏巍同志来到天津,特别想去看望一下孙犁,作为战争年代的老战友,他们已经有多年没有见面了。此时,孙犁已从多伦道天津日报社宿舍搬进了鞍山西道的单元房。就在去年,孙犁还曾做过一次手术,身体尚在恢复期。当他听说魏巍夫妇来访,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下来。

我为两位老人联系好时间,引领魏巍夫妇乘车至孙犁家的小区,来到家门口时,孙犁已经闻声在门前等候。两位老战友彼此寒暄着,紧握双手进到室内,看得出来他们相见时的喜悦。由于病后初愈,孙犁身体有些虚弱,但对于魏巍夫妇的来访,老人确实很高兴,他给我们沏了茶,问起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岁月让他们老去,表达也变得简洁、含蓄而富有深意。孙犁对魏巍的老伴儿刘秋华也很熟悉,他们还聊起了家乡的一些往事。拜访的时间不长,因为魏巍夫妇当天还要赶回宾馆并返回北京。临别时,我在客厅里摆好三把竹座椅,让三位老人坐在一起,用自备的相机为孙犁和魏巍夫妇拍了一张合影。后来得知,照片背景上的那副春联,是1988年孙犁75岁生日时,由作家王昌定撰文、辛一夫用草草书所写:文章耐寂寞 点点疏星映碧海 白发计耕耘 丝丝春雨润青山。

这张照片不仅是我个人保存下来的,孙犁在晚年时的最后一幅完美形象,而且对于孙犁研究者来说,也是晋察冀时期两位老作家友谊的见证,贵为独一无二的图片资料。

1996年,我终于要出版第一部诗集《迟献的素馨花》,设计封面时,我想请魏巍同志题写书名,不知道魏巍同志能否答应。时间不长,李钧就给我寄来了魏巍的题签,看着带有文人气质的潇洒的书名,我兴奋不已,深怀感激。我的第一部诗集因为有了魏巍同志的墨笔,而增添了亮色。

在多年的交往中,魏巍同志相继赠送给我多部新著,除了《火凤凰》《地球上的红飘带》等,还有10卷本的《魏巍文集》。1997年秋天,他特意让李钧捎给我一幅装裱好了的书法条幅:“书囊应满三千卷 人品当居第一流”,并题上“曙光同志留念”。我默读这两句赠言,感觉这已不是单纯的书法作品,而是魏巍同志以题写的人生赠言,意在勉励我多读书、勤创作,作品与人品相统一。这份情谊,让我将前辈作家的殷殷期望,铭记心间。

这之后的好多年,我们没有通过音信,也无缘再见到魏巍同志。有时是读到报刊上的消息,有时是看到一两幅照片,蓦然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人也显得消瘦、苍老,这让我颇为伤感,唯有送去心中的祝福。2008年8月24日,魏巍同志去世,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但曾经有过的那些美好回忆,却没有逝去,让我无比珍视。记得孙犁曾说过,在红杨树的作品里,洋溢着丰富的情感。他的诗是有力量的,就是在战场上,也是有力量的。这是战友的赠言,也是历史的留声。

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共同的朋友,相交几十年的诗友、军旅诗人李钧,也突然因病去世。悲伤之余,我找出他上世纪70年代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军号声声》,重新默读上面的诗行,眼前便又出现他年轻时一身戎装的身影,在北京军区家属院,他那样热情地带着我去拜访魏巍同志,并张罗着拍合影,如果他仍然像当年照片上那样微笑着该有多好……

想起刘绍棠

刘绍棠将小说寄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身份还是学生,编辑部特别关注了这位小作者,并未因为他还是个学生,就埋没他的作品,而恰恰看重他还是在校生的身份,特别扶植了刘绍棠,将他几千字的小说,完整地刊发出来,而且是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这对于一个尚在学习期间的学生少年,该是多么神奇的体验。这样的渊源,让刘绍棠记住了《天津日报》,记住了它的文学副刊,记住了主持副刊工作的孙犁先生。

1979年元月,《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复刊,经过“文革”之后的副刊工作急需步入正轨,在重新恢复联系的老作者名单中,便列有刘绍棠的名字。我初识刘绍棠应

舒群印象

舒群晚年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交往,是由孙犁引荐的,他们曾是延安鲁艺时期的老同事,有着三十年的旧谊。1981年4月,孙犁读到了当期《人民文学》上刊登的舒群的小说《少年Chén女》,当即写下了《读作品记(五)》。这篇兼有怀念性质的评论文字,既有感情,又解读深刻,是真正读过作品之后引发的感想。孙犁还特别提到当年在教学上他与舒群之间有过的一次分歧和在生活中舒群给予他的关照。

孙犁在《天津日报》的情况,舒群是了解的,他知道孙犁一直在主持、关心着“文艺周刊”这块文学版面。“文革”结束后,1979年1月,“文艺周刊”重新复刊,立即着手集结新老作家队伍,而自上世纪80年代初,舒群也逐渐恢复了写作,见到老友的评价文章,他自然高兴,所以当我们凭借孙犁的关照向他约稿时,舒群很认真地接受了这种联谊,稿件的事总是很爽快地应允。

第一次去北京拜访舒群,我是和李牧歌一起去的。李牧歌时任“文艺周刊”主编。北京的春天,遍地芳馨。初次见面,我们之间竟没有任何陌生感,倒像相识已久的老朋友。舒群先是问候了孙犁的近况,然后说起自己的创作,热情之中带着真诚。我们如愿拿到舒群的小说稿后,第一时间就去告知孙犁。在家中,孙犁翻动着我们带去的舒群作品的稿纸,赞赏地说:看看这稿子的字迹,写得多么工整啊。我们都感到惊奇,这篇小说稿是抄写在方格纸上,一笔一画,就如同小学生写作文,干净整洁,很是少见。

1983年9月15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舒群的小说《无神者的祈祷》,也即被孙犁称赞抄写工整的那篇小说。这篇小说对社会上及文艺界的一些恶俗进行了鞭挞,有些尖锐。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还引发了一些议论。有一天李牧歌对我说:市委宣传部的叫我们去一趟,说是关于舒群小说的事。那天下午,我们来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见到了当时的文艺处处长,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约稿情况,又听了对小说的看法,然后才讲了请我们来沟通的原因。谈话时间不长,彼此都很客观地陈述了对作品的意见,此事到此为止,过后并未形成什么文字材料。李牧歌主要讲到这篇小说的立意、主旨、内涵,她认为都是不错的,小说的犀利恰恰说明作品的深度。

这年深秋,我们想为“文艺周刊”约一篇纪念毛泽东的稿子,又一次来到舒群家。我们说明来意后,舒群凝神想了想,然后对我们说:这样吧,我带你们去找黄树则,他是毛泽东曾经的保健医生。说完,他便起身去打电话。不一会儿,他过来告诉我们已经联系好了,说黄树则在家等着呢。黄树则家住景山公园附近,那天晚上,我们约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舒群的介绍,黄树则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很快,稿子就写来了。1983年12月29日,“文艺周刊”发表了《毛主席告别杨家沟》,黄树则的文笔很好,回忆了当年亲历的往事,属于独家稿件。

1984年9月26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又发表了舒群的另一篇小说《在天安门前》,主旨是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而写,笔力依然老道、醇厚。这两篇小说都使我印象深刻,拼版时为了美化版面,我还专门约请百花文艺出版社美编室的王书册(后任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画了两幅单线条的插图,使得这两期版面尤显大气、漂亮。

李牧歌离休之后,又到《文艺》双月刊编辑了一段时间的刊物,依然保持着与舒群的联系,而我在“文艺周刊”则继续维系着前缘,只是再去约稿时,就是我自己独来独往了。有一次,我中午前赶到舒群家,说完稿子的事准备告辞,舒群非要留我吃饭,热情得让我无法拒绝,只好客随主便。他让保姆做了一碗鸡蛋面汤,盘子里放一个烧饼,虽然只是一顿极简单的午餐,却让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文艺部其他编辑都对舒群留有良好印象,说好的稿子言而有信,从不推诿,并受到过暖如家人般的对待,不管哪位编辑赶在了饭口,都要留下来吃完饭后再走。

舒群在晚年时,依然葆有创作激情,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交往,他是高兴的、愉悦的,这从他接待我们的态度上,就能够感觉得出来。找舒群约稿,到他家去,从来没有拘束感,他送给我的一本小说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柜中。他那时也在编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很劳神。在写作上,他总有许多话题要说。那是一段珍贵的时光,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直到他于1989年病逝。每次见面,都能感觉到他的身体不是很好,看得出来体质弱,他的较早离世令我深感痛惜。

每次约稿从舒群家出来,他总是亲自送到马路边,天冷时,就披上一件外套,因不能久站,就蹲在道边上,望着我们离去。我常要回头摆手,看到的竟是一位老农民,蹲守在田边,望着眼前待收的庄稼。

怀念魏巍

魏巍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作家,这当然始自学生时代读过他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后我当了编辑,阅读晋察冀文学作品时,得悉“红杨树”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巍,又让我多了一份仰慕;再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在孙犁先生家中,我们时常会谈起一些老作家,听到魏巍的名字便很亲切。我读到孙犁写的《红杨树和曼卿的诗》,知道在战争年代,孙犁曾将魏巍的一本油印诗集抄录后出版,真是艰苦环境下结成的一份战友情。所以,当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出版时,外界曾传说是请孙犁阅过,先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选章,就是经过孙犁的润色。这些都是当时听到的传言,未经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孙犁与魏巍确是一对老战友,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使他们相互信任,彼此敬重。

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时常默念“魏巍同志”。终于联系上魏巍,缘于我的一位诗友李钧。当年原是属于天津驻军的李钧,勤于诗歌创作,被调往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魏巍是他的直接上级、老领导,他们之间关系融洽,成为忘年交。李钧答应将我的问候和约稿,一并带给魏巍同志,这让我很是感激,也是心怀已久的愿望。

这种牵线真是一种缘分,孙犁——《天津日报》——魏巍。李钧很快就将消息给我,说魏巍同志很高兴,已经应允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写稿。能够与魏巍同志建立联系,我是非常兴奋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魏巍同志都是我们副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2